战火淬炼的隐蔽战线尖兵——艾青山

艾青山（1914—1985），男，河南省叶县旧县乡北寨人。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13岁时，父亲被土匪打死，不久，母亲病死，姐姐出嫁，大妹和弟弟被水淹死，小妹由叔伯作主送给别人做义女。他孤苦伶仃，四处流浪，后为谋生，被兵贩子卖给胡宗南部当兵。1936年11月，在环县山城堡战斗中投入红军，被分配到红一军团第一师回民连机枪班当战士。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参加红军后，在党的教育下，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平时工作积极，团结同志，作战勇敢，很受战友们的推崇，不久，就担任机枪班班长。1937年2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1938年9月，提拔为警卫排政治指导员。1939年2月，为了培养党的少数民族干部，上级决定让艾青山带领排里的全部回族同志去延安学习。到延安后，先在抗大第一大队第一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又进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学习结束时，中央西北民族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罗迈（李维汉）找艾青山谈话，决定让他到陇东回民地区做地下工作。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正规部队，来到甘肃陇东，在隐蔽战线上工作。

1940年2月，他奉中共陇东特委回民工委的指示，从边区来到彭阳。当时的彭阳因毗邻边区，国民党封锁十分严密。西征红军撤离后，国民党除派正规部队驻防外，还配有大量的反动地方武装及特务，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但他不畏艰险，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层层盘查，先后与堡子崾岘地下党支部书记姬满祥、石家沟口党支部书记马义仁、峁家堡子党支部书记赵正明接上联系，以陇东特委回民工委特派员的身份，担负起领导彭阳境内地下党支部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他化名马德富（人称“马布客”），以小商贩职业为掩护，肩挑货郎担，走村串户，足迹踏遍彭阳。他秘密发展党员，搜集情报，领导峁家堡子地下交通站，于边区和国统区间迎来送往。

1941年5月，海固回民第三次起义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疯狂围剿，情势危急。起义领导人马思义派人持信夜晚前往边区求援，途经彭阳。艾青山得知后，与送信人秘密接头，问清情况，连夜将信送交中共陇东特委。在得到上级党的明确指示后，他又顾不得休息，连夜将党的指示设法传送给义军领导人，使义军及时突围进入边区，投入党的怀抱。他的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党组织将他调回边区，在陇东地委统战部工作。1942年8月调任甘肃华池县元城区委宣传科长。在元城区委，他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被树立为模范科长，受到中共华池县委的表彰。1943年10月至1944年5月，艾青山参加了陇东地区的整风运动，整风结束后被调到环县县委统战部，初任干事，后任部长。他还利用关系，巧妙地打通了党与民盟西北负责人杜斌承的联系，扩大了统一战线。

1947年10月，海固工委成立时，艾青山调到海固工委，任工委委员。1948年4月，固东工作团成立时，他任团长。这期间，他经常秘密往来于彭阳与边区之间，是解放战争期间彭阳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带领有关人员，在彭阳境内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的油印本秘密散发，使人民深受鼓舞，使敌人深为恐慌。他率领武工队，对国民党地方武装自卫队长王自彦三擒三纵，使其悄然退去，龟缩在家，再不敢与人民为敌，震撼了敌人营垒。领导境内地下党支部坚持斗争，使人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他发动党组织带领群众抗粮抗丁抗税，反抗黑暗势力，在彭阳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还在斗争中亲自发展党员20多名，为彭阳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干部。

（据固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闵毓华：抗日救国 敢为民先

闵毓华（资料图片）

闵毓华（1913年——1940年）字荣轩，化名马玉华，回族，北京市宣武区牛街人。闵毓华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3岁前读过二三年私塾，1928年8月考入北京回族中学（后改为西北中学），并取得免费入学待遇。

1930年下半年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被选为自治会主席。1931年7月，闵毓华在西北中学发起成立“励进学会”，油印《励进》刊物，传播革命思想。但仅出两期便遭学校当局停刊。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闵毓华为首的西北中学学生自治会，参加了北平市中等学校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进行街头宣传。1934年，闵毓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6年2月，闵毓华在北大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他利用寒假，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伟大意义，在牛街秘密建立了民先小分队，扩大了抗日救亡队伍。

当年春，闵毓华响应民先总部深入民众、宣传民众、唤起民众的号召，来到漯河励行中学任教。漯河励行中学是爱国人士高靖侯为教育救国而创办的一所完全中学。

闵毓华到这里不久，就和学校的几位共产党员教师取得了密切的联系。闵毓华年纪较轻，迅速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教唱抗日歌曲，给学生介绍北京“一二·九”运动，在学生中组织演唱队、口琴队、歌咏队等，走出校园，深入农村和大街小巷宣传抗日。

闵毓华还积极支持几位共产党员老师发起成立的“学生自治会”。自治会指导学生写进步文章，占领地方报纸的阵地，在漯河《警钟日报》上开辟文艺副刊《心曲》，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

励行中学的抗日救亡宣传遭到了地方反动当局的镇压。闵毓华等人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斗争策略。他联络北平学联不断寄来一些学联的机关刊物和油印宣传品，还自己集资订购很多进步书刊，如《华北呼声》《世界知识》《永生》等，在全校掀起了广泛的课外读书活动。

闵毓华还重点培养积极分子，向他们介绍北京“民先队”组织活动情况，秘密发展8名先进分子为首批“民先队”队员，属民先第十九分队的一支小队。

“民先队”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地方反动当局和国民党驻军新五师的粗暴干涉，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要将闵毓华等逮捕查办，闵毓华遂被迫离开漯河励行中学。

“七七事变”发生后，闵毓华在北平发起了“华北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日军攻入北平城时，下令通缉他。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保护下，他离开北平，于当年11月辗转从西安到达延安，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夏，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到西北回民地区工作，任兰州回民特支委员。负责编辑《回声》杂志。在兰州他结识了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

1939年底，国民党特务盯上了他，特务从北平经河北一路赶到兰州。中共甘肃省委为了闵毓华的安全，便将他立即转移到宁夏银川。

1940年春，日军飞机对银川进行狂轰滥炸，闵毓华被弹片切中腹部，为国捐躯。时年27岁。1961年，闵毓华被追认为烈士。

（据中国军网、《漯河晚报》）

贺家堡战斗：红二方面军在宁夏的大胜仗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驻地贺家堡会议会址。（资料图片）

贺家堡在海原县城以北十二公里处的贺堡河西岸，坐落在海（原）同（心）公路旁。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后，国民党军为堵截红军北上，命令胡宗南部、马鸿宾部和东北军何柱国部等前后围堵红军。29日至31日，红二方面军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率领下，通过曹家洼（今海原县曹洼乡）阻击战、杨明河突围战等战斗，顺利实现突围。

10月31日，红军总部和三十一军主力自海原甘盐池到达关桥堡。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和政委聂荣臻率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临时划归指挥的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贺家堡（今海原县关桥乡贺堡村）一线布防。

从曹家洼撤防到海原县城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六师，向麻春堡（今海原县关桥乡麻春村）的红二方面军总部和撤往贺家堡的红一军团追击。此时因海打战役未能打成，红军正憋着一股劲，见敌军追击，左权、聂荣臻决定进行反击，给敌人一些教训。于是左权命令一师、七十三师和骑兵团佯作狼狈退却，引诱国民党军前进，寻机歼敌。国民党军尤其是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看到红军慌乱溃逃，立功心切，便气势逼人地向退却的红军疾驰而来。左权指挥一师、七十三师在贺家堡、涧沟堡、麻春堡一线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待机。

贺家堡村东山梁一直延伸到贺堡河畔，红一师就在山后埋伏。村西有条鸦儿涧沟，红七十三师就埋伏在这条沟里。红军骑兵团留在贺堡河畔的大道上，作出逃窜的样子，引诱敌军追击。左权站在设在山上的临时指挥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着埋伏在山两侧的红军作战部队行动。

傍晚，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和骑兵第六师所部骑兵进至贺家堡，左权一声令下，埋伏在贺堡河两侧山中的红军一起开火，一时枪声大作。国民党军遭到红军突如其来的打击后，乱作一团，前卫的骑兵第六师官兵干脆不做抵抗，纷纷下马举手缴械，三十五师骑兵团见到此景，也只好效仿。后续的国民党军见前边中了红军埋伏，自顾自地逃向了县城。

红军干净利落地歼灭了国民党军前卫的两个团，俘获国民党军人员、马匹、枪支各千余。这场战斗史称“贺家堡战斗”，是自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来的第一场大胜仗，胜利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红军各作战部队，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战斗结束后，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红军对被俘官兵以礼相待，经过教育，全部释放，并退还了战马武器，扩大了红军良好的政治影响。

1936年11月1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自麻春堡移至贺家堡。当时村里的群众因国民党县政府的反动宣传，在红军到来前基本上都跑光了，李文举新筑的堡寨也空无一人，于是贺龙就决定将这里设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驻地。

11月2日晚，朱德总司令来到贺家堡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看望、慰问红二方面军指战员，以鼓舞红军士气。朱德总司令来到贺家堡后，当晚就住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11月3日，朱德总司令在堡寨内参加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鼓舞士气，动员部队做好消灭敌军的战斗准备。

光阴似箭，西征红军在海原的战斗历史，在今天的人们心中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历史的变迁总是从最初开始的。无论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初的故事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当年红军战斗过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拂去历史的尘埃，红色革命的青石碑和贺家堡战斗遗址，至今完好保存着，它们在晚霞中熠熠闪光。

贺堡村在中国革命和红军西征历史中，有着一段闪光的特性。它神秘而又质朴，贫瘠而又璀璨，用它苍黄的胸膛为红军挡过敌人的子弹，它是海原县一处被红星照耀的土地。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海原县融媒体中心）

“幸福渠”：延安时期的红色水利工程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期间，继续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革命旧址内，有一条叫“幸福渠”（裴庄渠）的水渠横穿枣园流过。水渠尽管不长，却是大生产运动和延安精神的历史见证。

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雨少风多，常遭荒旱，所谓“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加之边区地广人稀，农业生产大部分仍沿用相当原始的简陋技术和工具，所以这里每年群众收获的丰歉，几乎完全决定于雨量的多少，这说明在这个地方靠天吃饭是靠不住的。

但是，试图通过兴办水利以达到增加农业收获的目的，在陕甘宁边区也绝非易事。首先从历史上看，陕北这个地方曾有过三次兴修水利，但这三次无一例外都失败了。而在当地群众看来，修水利既费劳动力又花钱多，倒不如去开荒。因此，就在延安市裴庄渠修建之初，当地老百姓对这个水利工程能否产生效用，同样是表示怀疑的。有人说：“修水地太难了，不成功白花费银钱。”还有人说：“整理一垧水地，倒不如开三四垧荒地打的颗子多哩！”有些老百姓甚至抱着这样的态度，宁愿把地丢下，也不愿分摊修理费。

针对这些情况，深入宣传发动和解释工作成为先决条件。边区政府用了很多宣传手段，给群众解释为什么要兴修水利以及水利工程带来的好处等，同时向他们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其中，用具体鲜活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无疑是获得群众真正信任和拥护的不二选择。而裴庄渠的修建，就承担着这样一个示范水利工程的使命。修建它的意义，就是要打破一般群众对修水利的错误见解，给边区的群众看，告诉他们修水利并不是难事。而只有兴修水利才是预防旱灾的重要途径，才有可能增加农业收入，实现丰衣足食。

兴修水利应该“大家动手”。延安市裴庄渠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广泛动员附近群众共同建成的。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4000元，并指派毕业于北洋工学院（天津大学前身）的边区水利专家丁仲文负责勘测设计，指导当地群众修建。由于当时科技人员缺乏，参与设计修建的除了丁仲文外，其他都是没有土木工程科学知识的工农干部。于是，丁仲文手把手地教，最终使大家学会了使用仪器、设计坝址等科学知识。而在财力及现代建筑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丁仲文和大家共同想办法。他们克服困难，就地取材，采用碎石坝挡水，用木板作闸板。在这种艰苦困难的客观条件下，延安市裴庄渠从1939年8月动工，到11月封冻前已完成了主要工程。次年3月解冻后继续施工，4月底建成竣工并开闸放水。

陕甘宁边区政府除了直接拨款外，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2元进行入股，成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社，并由参加水利合作社的群众民主推选出担任主任、会计、宣传、组织、工程等工作的5个委员，负责水渠的护理和灌溉等事宜。

为了提高裴庄渠的利用率，用“看得见”的丰收果实教育群众，自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还派了技术工作人员，组成裴庄水利管理所，亲自经营着30亩枣园农场。由于经营管理得好，仅用了7个月就获利45700元。

“新式水利工程”的第一次试验。兴修水利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边区农业环境进行保护和改造的探索实践，这在边区不啻为一种伟大革新。因而，延安市裴庄渠修建伊始，就被《新中华报》誉为“新式水利工程”，称“这在边区还是第一次试验”。

当然，陕甘宁边区水利事业的探索实践，也并非一路顺利。事实上，就在裴庄渠建成竣工后不到2个月，也就是1940年6月末，延安市附近各县就遭遇山洪冲击。“山洪暴发，水头高约2丈，冲动了数万斤大石，2尺直径的大树，被拔起滚流下来，冲击力更大。”汹涌的山洪，直接造成竣工不久的裴庄渠大坝被冲毁。

这次裴庄渠因山洪受灾虽大，但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和当地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按照“支费小而收效大”的原则于同年10月再度动工。这次水渠重修，吸取了前一次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新法修筑的内容与当地的具体条件和民间的历史经验很好结合起来，对水渠进水口等进行改修。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裴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建成。

“幸福渠”水流不尽。建成后的延安市裴庄渠，自裴庄起，经过了庙嘴、磨家湾、枣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约6公里，灌溉面积达1500亩。作为陕甘宁边区延属分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渠，据1943年春天统计，能放水的有1072.5亩，每亩以增收细粮三斗计，年可增收细粮321.75石（1石约为50公斤），解决了延安市机关的蔬菜问题。应该说，裴庄渠的建成使用，让枣园、裴庄一带的群众变“靠天吃饭”为旱涝保收，极大地惠及了当地群众，裴庄渠由此也被称为“幸福渠”。

也正是在“幸福渠”的示范带动下，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后春笋，普遍发展起来。据统计，1943年全边区的水地共13647.6亩，增收的细粮可供约一万人一年食用。总的来说，兴修水利极大增加了粮食产量，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 **（据《学习时报》）**

说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坐落在延安市南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的北侧石崖下，与宝塔山遥相呼应，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会的会址。

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在参议会礼堂后山上的土窑洞办公。1939年1月召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借用延安城北陕北公学礼堂作为会场。为了使边区200万人民有一个固定常驻的会址，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边区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共同决定建立一座“坚固、美观、实用的参议会会场”。随后，由边区民政厅、建设厅等有关机关成立了会址建筑委员会，委任曾在上海建筑公司任职多年的工程师毛之江作图，边区建设厅工程科科长丁仲文、工程师李傅缙施工，建筑结构由延安自然科学院杨作材改正，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钟敬之承担礼堂内部装置设计。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于1941年3月动工。在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号召下，边区各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战士均轮流加入到工程建设中来。经过边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参议会礼堂于10月竣工。建成后的边区参议会礼堂长十三丈五、宽七丈五，可同时容纳1000余人开会。谢觉哉为礼堂题写“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刊刻于正面门额。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此举行，到会参议员219人。大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9个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条例、决议以及400多件提案，详细审查边区政府三年来的财政开支，改选边区政府委员会和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在18个政府委员和9个参议会常驻委员当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很好地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指出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这届参议会历时半个月，盛况空前。此后，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边区三届参议会也先后在此召开。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全体参议员听取政府工作报告，检讨政府工作，决定各种重要政策、应兴应革事项，选举参议会正副议长、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等，由此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局面。

边区参议会礼堂不仅是参议员代表人民议事管事、监督政府的固定会场，也是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如1943年11月26日至1944年1月7日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1944年5月1日至25日召开的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1944年5月24日举行新的延安大学开学典礼；1944年10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大会；1946年11月11日召开的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干部动员大会等，均在此召开。 **（据人民政协网）**